

呂鍾寬◎輯著
王 珊◎主編

鄭長鈴◎副主編

泉州南音（絃管）集成

【第九册】

泉州南音（絃管）集成

【第九冊】

呂鍾寬◎輯著
王 珊◎主編

鄭長鈴◎副主編

責任編輯:詹素娟
特邀編輯:程文梅
裝幀設計:東方天地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泉州南音(絃管)集成·第九冊/呂錘寬 輯著;王珊 主編.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01-017807-3

I. ①泉… II. ①呂…②王… III. ①南音-泉州-文集 IV. ①J632.3-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41373 號

泉州南音(絃管)集成

QUANZHOU NANYIN (XIANGUAN) JICHENG

第九冊

呂錘寬 輯著 王 珊 主編 鄭長鈴 副主編

人民出版社 出版發行

(100706 北京市東城區隆福寺街99號)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開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張:24.25

字數:380千字

ISBN 978-7-01-017807-3 定價:189.00元

郵購地址 100706 北京市東城區隆福寺街99號

人民東方圖書銷售中心 電話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凡購買本社圖書,如有印製質量問題,我社負責調換。

服務電話:(010)65250042

序 一

寶藏在民間：呂錘寬教授輯著《泉州南音（絃管）集成》出版感言
喬建中

1979年，已經從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音樂系畢業數年的本科生呂錘寬，應臺灣師範大學知名教授許常惠先生之邀，參加了“鹿港地區南管音樂調查”專案，自那年以後，他的學術興趣和熱情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這一在臺灣稱作“南管”，在福建稱為“南音”的優秀傳統音樂品種。36年以來，錘寬先生拜師研習、悉心搜羅、堅守田野、勤於納錄，最終以一人之力，為這套卷帙浩繁的《泉州南音（絃管）集成》資料收集整理和出版，提供了扎實的基礎。

十分巧合的是，也就在1979年，大陸這邊啓動了一項前無古人、浩大宏偉的民間文化遺產整理工程——“十大民間文藝志書”的編纂。當年7月，文化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音樂家協會聯合下達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區組織專業編輯部，以省、區為單位，分類編纂民歌、舞蹈、戲曲、曲藝、器樂等十部“集成”。自此，各省區先後動員萬餘名民間文藝工作者，一方面梳理20世紀以來幾代學人收集記錄的相關樂譜文字圖片文獻，一方面再度對當代仍然流傳存活的各種民間藝術品種進行全面普查，以發掘新的口碑材料。至2009年10月，30個省區的296卷“集成”全部出版。作為一個古老文明國家的民間文化大典，“集成”實現並完成了本民族的一個偉大的文化理想和使命，也以其三十年的煌煌業績被人們親切地譽為“集成時代”。

呂錘寬先生的南音學術之旅，在時間上正好與“集成時代”重合，且

從最終成果看，也不無契合之處，二者都具有民間文化資源現代整理的性質，但認真檢視，兩者又多有不同。例如，“十大文藝志書”是中央政府的一個重大文化行為，其範圍幾乎包括了中國各民族各地區歷史上流傳至今的所有民間文藝種類，並明確提出“範圍廣、品種全、品質高”的編纂方針。又因為任務繁重、編選數量巨大，所以從縣、市、省到中央，四個層級的參編隊伍也空前的多。而呂錘寬先生之于“南音”，最初完全屬於個人所為。早期，他也没有要編纂“南音集成”這樣龐大的計劃，他所專注的對象，僅限於南音一個品種，並且是以一個音樂學者的態度進入這個領域的。就此而言，“南音集成”或可視為個體學者為一種傳統音樂品種編就的樂譜文獻總編，而“十大文藝集成”則是一個龐大的群體為 56 個民族所有傳統音樂品種修編的國家文化典籍。在編纂思想和策略上，二者一個偏於“廣”，一個偏於“狹”；一個求“大”求“全”，一個求“小”求“專”；一個屬“面”，一個屬“點”。目標、結果雖有共同處，但策略、方法、視域又有不少差別。以往，對於 296 卷的“大集成”的價值、意義、功過，已經有很多專論做過評述。而對眼前這部僅涉及一個傳統音樂品種的“小集成”，編纂者一定十分期待出版之後有很多同行撰文批評、討論。本人作為與錘寬先生交往近三十年的摯友，願意先利用作“序”的機會，談談自己的粗淺認識。

二

首先，人們一定想知道，錘寬先生在過去 36 年間與臺灣南管或泉州南音結下了怎樣的“緣分”？他們之間如何開始？如何進入？又如何深入？直至南音如何成為錘寬先生學術生命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等等，再進一步，則會就此提出一個普遍性的追問：一個嚴肅學者與自己認定的研究對象應當建立什麼樣的關係？

那麼，“緣分”從哪裏開始？

錘寬先生說：在文化學院音樂系四年，他曾聽過不少中國傳統音樂，但只是聽聽而已，並未對他的內心有過特別的觸動。直至 1978 年，他進

入“洪健全視聽圖書館”，偶或聽到“南管”錄音時，他的心動了，並發現這就是自己多年追尋的傳統音樂。接下來，就有了跟隨許常惠教授調查鹿港南管之行，這算是他第一次走進南管音樂及其傳人的生活。而自此之後的幾十年，他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傳統音樂的全部寶藏永遠都在民間。鑑於此，他的研究工作都是以這一理念展開的。第一是田野考察——早先主要是在臺灣各地，近十餘年又延展到泉、廈兩地，與泉州師範學院以王珊副校長為首的團隊全面合作。期間，他個人對南管的田野調查從來也沒有中斷過；第二是拜師學習——他把這樣的方式視為進入南管音樂最有效的途徑。因此，不僅認真學琵琶與散曲唱念，也接觸了二絃、洞簫。如果讓他列出他的“南管先生”名單，至少在十餘位以上。2011年端午節，他與王珊等學者在泉州策劃舉辦了一場“南音耆老座談會”，與他同行的張鴻明（1920～2013）先生，就是他老師之一。那年，張先生已經91歲高齡，鍾寬一直侍奉左右，敬如父輩；第三是努力尋找民間手抄南管譜——口傳雖然是南管傳承、傳播的生命線，但是各個館閣保留的手抄傳譜對於南管而言，同樣具有舉足輕重般的意義。一方面，手抄譜是習得南管的重要依憑，另一方面，在輾轉傳抄中，又會繁衍出許多新的變體，增加了南管音樂的蘊藏，他多年在兩岸館閣尋覓到的手抄譜，恰好成為這次編纂《泉州南音（絃管）集成》的基礎；第四是學術研究——第一次調查鹿港南管音樂不久，鍾寬先生就考入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隨許常惠、吳春熙教授攻讀研究生，1982年以《泉州絃管（南管）研究》一文獲碩士學位。此後，又陸續出版了《泉州絃管（南管）指譜叢編》《南管記譜法概論》《南管音樂》《張鴻明生命史：來自遙遠地方的音樂》等。在海峽兩岸，鍾寬先生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一向居於前列；第五是南管在高校的傳承教育——當他自己在南管音樂研究方面有了較多的積累後，就產生了把傳統音樂引進高校的想法。1995年，鍾寬先生於臺北藝大規劃成立傳統音樂系並任創系主任，很快他就請南管、北管、琵琶、七弦琴藝術家們來學校任教。後來他轉任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仍然延續這一做法，用以堅持開展傳統音樂制度性傳承的嘗試，並由此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和廣泛的社會影響。

我們都知道，南音作為一個延續千年的大樂種，其生命力的源泉首先

來自一代又一代的傳人。一旦傳人“缺位”，南音將失去生存的條件。其次是它一貫沿用的口傳方式，這也是所有民間音樂保持其鮮活、本真和樂種風格的基本前提。“口傳”既包括聲樂，也包括器樂。第三是手抄的樂譜，它是很多民間器樂或有器樂伴奏的古老樂種不可或缺的記錄手段。鍾寬先生深知以上三個因素與南音傳承千年的因果關係，所以才有他三十多年信念、興趣的執著和上述五種尋寶、探寶活動的堅守。

毫無疑問，這是研究對象與學者間的一種良性互動。對於一位嚴肅、執著的學者而言，研究對象如一座資源豐饒的大山，遠看是一種感覺，走進去是一種感覺，深入其中後更會有新的感覺和頓悟。為什麼有些學者青年時期選定某個對象後，一直可以持續研究到他生命的終結？原因來自對象自身的價值，同樣也來自學者的睿智、執著和中國文人自古就宣導的“弘毅”精神傳統。還在二十多年前我與他相識不久，就直覺到鍾寬先生的這種精神。1989年他為考察道教音樂來大陸，兩個月期間，幾乎跑遍全國各地最著名的叢林道觀。而選擇的交通方式全部是乘坐火車。當時大陸的鐵路狀況我們是知道的，印象最深的是他一次從北京到太原竟然站了七八個小時。聽說之後，連我都感嘆良久，但他只是笑笑而已。以這樣的精神投身於自己的研究對象，正是他日後在南音研究領域取得諸多碩果的真正原由。

三

如前所述，優秀的學者與藝術人文價值巨大的研究對象之間，總是會形成某種良性的互動並產生高品質的學術成果。其中，中國古代史與楊蔭瀏、七弦琴音樂與查阜西、西安鼓樂與李石根，都可以稱為音樂學界的典範，泉州南音同樣如此。無論是作為積累了千餘年的歷史型樂種，還是作為一個蘊藏著數千首曲牌、“滾門”，廣泛傳播於大陸、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東南亞諸國的跨界民間樂種，泉州南音的歷史沿革、本體構成、傳承脈絡、社會維護等，都是值得用一生去探究的研究對象。正因如此，自20世紀80年代起，南音曾在日常傳唱、相互交流和學術研究方面出現了一

個持續的歷史性熱潮。鍾寬先生恰恰在這個“南音熱潮期”步入這一研究領域。與眾多學者不同的是，他更偏重于南音的曲調系統、曲詞文學、手抄曲譜和傳人譜系等方面，亦即南音的本體研究。《泉州南音（絃管）集成》集中反映了他在這一領域的這一專題所做的一切。

“集成”者，集（輯）某一類別、某一學術著述之“大成”也。古來有兩種做法。一是依原貌把相關文獻按系統按類別整編為一體，卷本可多可少，多者上萬，如《古今圖書集成》；少者或十或百，無統一規定。另一種做法是經過學者的長期研究，包含編者自己的研究心得、理論歸納後做有系統的編纂。較之前者，它的學術含量增加了，體例、內容皆具有一定的個性色彩。“十大文藝集成”、《泉州南音（絃管）集成》均屬此一類。

據鍾寬先生報告，他所搜集流傳至今的南音曲目，含有琵琶指法譜以及僅曲詞者總數約 6000 首，呈現於第一至第十冊的曲詞卷。曲譜卷估計收錄 4000 首，涵蓋了三十多年來他在臺灣各地和閩南諸市縣收集整理的大多數樂譜資料。前十冊的曲詞部分，每冊有重點內容和類別，如：絃管總論（第一冊，500 首）、本集成引用之曲譜（第二冊，500 首）、樂曲種類（第三冊，650 首）、滾調類（第四冊，730 首）、曲調系統（一）（第五冊，540 首）、曲調系統（二）（第六冊，約 600 首）、曲辭文學（第七冊，480 首）、（第八冊，460 首）、犯曲（第九冊，470 首）、過枝曲和大小都會套曲（第十冊，約 500 首）。全套集成以曲目為主體，同時既有南音總論，也有關於器、調、曲、辭的分論，又為犯曲、過枝曲專設一卷以及他在鹿港與臺南新發現的九套“大小都會套曲”。諸卷論述全面有序，體例通曉清晰，呈現出一個十分完整充實的南音音樂構成全息性體系。僅僅翻閱一遍，就可窺得該樂種的全貌，且會有感而嘆曰：鍾寬先生 36 年的辛勞，可圈、可點、可讚！

四

2010 年 3 月，當 296 卷“十大文藝集成”全部出齊後，我曾在一篇

長文中明確指出：這是個有歷史意義的界標，它意味著“集成時代”的結束，同時，我們也將迎接一個“後集成時代”的到來。

“後集成時代”的主題是什麼？我的看法是，它將對傳統音樂的活態傳承、保護方面推出一系列政策、方針、法律和理論研究新成果，同時伴有 21 世紀以來開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集成”編纂的許多未竟事宜等。出乎人們的意料，近十餘年，大陸各地出版了一大批屬於“集成”的新著，它們多數是因為當年編纂“集成”時，因為篇幅所限，而使很多品種的曲目未能入選，成為令人遺憾的“遺珠”。比如，《中國民歌集成·陝西卷》入選的陝北民歌為 594 首，而當時實際收集到該地區民歌約有數千首。為此，長期致力於陝北民歌採集、記錄的陝北音樂家霍向貴先生在集成完成後編輯出版了《陝北民歌大全》（1427 首）；以李民雄先生為首的江蘇、上海、浙江音樂工作者在《中國民族器樂集成·江蘇卷》完成後，又編出了《江南絲竹大成》，容量比江蘇卷中的“江南絲竹”多出五倍以上。類似的例子很多，它們成批出現在“十大集成”以後，已經成為“後集成時代”一個值得重視的文化景觀。就性質而言，輕一點說它們是那套“大集成”的補遺，重一點說，它們是“集成”作為一種文化事象的延伸和發展，就反應傳統音樂的某個品種而言，它們更具全面性和豐富性。以此看這套《泉州南音（絃管）集成》，鑑於它選入曲目的數量，鑑於它體例的完整有序以及學術深度，我們有理由說，它是“後集成時代”單一樂種“集成”的一個代表性成果。它的資料價值、歷史文化價值以及它在將來“南音學”（“絃管學”）研究方面的價值都將給後人以重要的啓示。

《泉州南音（絃管）集成》屬於鍾寬先生，屬於與他親密合作的泉州師範學院王珊副校長及其團隊，屬於兩岸所有的南音（絃管）傳人，屬於熱愛中華傳統音樂的全體同好！

《泉州南音（絃管）集成》是兩岸音樂家成功合作的範例。再次祝賀《泉州南音（絃管）集成》的正式出版！

2015 年 8 月 9 日下午 2 時 10 分

寫於陝北榆林高新區塞維利亞 1-204 室

序 二

勒銘承千年

王 珊 鄭長鈴

中華民族歷經五千年沒有間斷，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祖先有守護並不斷傳揚民族文化的傳統。這一傳統為我們留下了極為豐富、寶貴的文化遺產。不論是孔子刪詩還是清朝編纂《四庫全書》，抑或是號稱當代“文化長城”的“十部志書集成”工程，都是基於文化自信的“今人”對“前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傳統文化的整理。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區或個人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只有對自己的文化有自信，才能形成文化傳承的自覺、擔當起文化傳承的責任並推動其健康發展。

近年來，我國全面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不斷加強對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是“指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命力的各種措施，包括這種遺產各個方面的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和振興”。泉州南音是“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加強南音歷史沿革、本體構成、傳承發展等方面的研究，對南音曲譜等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收集整理，也是南音保護工作的要求。

作為地方高校，泉州師範學院承擔《泉州南音（絃管）集成》一書的編纂，不僅因應了高校教學、科研和傳承文化的需要，也是對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貢獻，更是泉州人傳承傳統文化責任的踐行。

一

南音乃漢唐遺韻、千年古樂，與北京智化寺京音樂、西安鼓樂等一起被稱為中國三大古樂，有著深厚、豐富的歷史文化積淀，是中國古代音樂體系的當代活態遺存，在中國音樂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以大量的曲目、古老的樂器形制和自成體系的記譜方法等，延續著漢唐以來中國音樂的血脈，是保存中國古音樂種類最豐富的重要樂種。作為音樂，它古樸優雅、清麗委婉，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和音樂學研究價值，在人類學、語言學、民俗學、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也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過去，拳頭、燒酒、曲是閩南成年男人或成功人士的標志。這裏的曲，當然不完全是南音的代名詞，但南音在閩南文化中的重要性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在閩南文化的諸多文化表現形式中，如木偶戲、梨園戲、高甲戲，真正優秀的從業者都必須會唱南音。從這一方面而言，南音是他們的母曲，是閩南文化的典型代表。換句話說，傳承保護好南音文化，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也有母體孕生的意義。但是，作為高速發展的經濟區，閩南雖然擁有深厚的文化傳統，其所面臨的沖擊和危險也是不言而喻的。由於種種原因，包括南音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在民衆尤其是年輕人之中的認同感在逐漸衰減，這是我們毋庸回避的現實。而也就是這樣的現實，才越發凸顯出人文教化、引導的意義。作為區域文化的共生體，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文教，文而化之，教化民衆，我們應合理利用傳統文化資源，充分調動現代教育平臺，為修復傳統服務，為延續南音文化的生命力而努力，更為充分發揮其在當代文化建設和未來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而努力。

二

2011年5月，泉州師範學院成立了泉州南音學院，這不僅是南音歷

史的一個里程碑，也是南音高等教育的又一次飛躍。2011年，泉州師範學院以音樂學（南音方向）申報“服務國家特殊需求”專業碩士人才培養項目，並獲得藝術碩士專業學位點。就目前而言，這樣一個民間樂種在高等院校設置本科專業，直到招收專業碩士，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而本科專業以及碩士專業的設立，南音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對編輯整理一套完整的南音文獻，尤其是南音曲目集成的需要，越來越迫切。

另一方面，泉州師範學院作為高校，除了為社會培養各類人才的要求之外，還有傳承與創新文化的責任與職能。2013年，經福建省教育廳批准，以泉州師範學院為牽頭單位組建的南音文化傳承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獲得認定。正如胡錦濤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時所說的，高等教育是優秀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也是思想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應該積極發揮文化育人作用，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在掌握前人積累的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創立新知，並傳播到社會、延續至後代，推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泉州師範學院出於閩南人傳承南音文化、傳承中華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責任擔當來完成南音集成的編纂出版工作，其目的是通過文獻的整理促進教學與科研，使南音文化在高校得到有效的傳承。

20世紀下半葉起，兩岸先後興起傳統文化保護與復興的熱潮，對於南音文化傳承的探索逐漸展開並引起廣泛關注。幾十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從各自角度對南音進行了研究，但在南音曲譜的整理方面，一直未見全面系統、可成典範的成果，如今《泉州南音（絃管）集成》經海峽兩岸學者攜手努力終於付梓，可喜可賀！

三

作為兩岸合作共同完成的成果，《泉州南音（絃管）集成》的編纂有其現實意義。明清時期，南音就傳到臺灣，並且在臺灣得到了很好的傳承和發

展。泉州師範學院與呂鍾寬教授合作來完成《泉州南音（絃管）集成》，一方面是基於其研究的基礎，另一方面是因為南音是兩岸共同的樂種，兩岸合作有著從古到今的紐帶關係。

南音不僅在閩南一帶流播，還隨着泉州人的脚步流播到臺港澳及東南亞地區。對於南音絃友來說，南音已經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歷程之中，成為其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當南音隨着泉州人的步伐流播海外，就成為了海外游子思鄉的慰藉，成為了需求自身認同的依托。文化傳播隨時間延續，許多文化表現形式逐漸隱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泉州南音却並未因時間的流逝而淡去。如今，南音已經化作連接海峽兩岸同胞和海外僑親的一條重要文化紐帶，對海外閩南人的文化認同起到重要作用。而在提倡“一帶一路”建設的今天，我國除了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交流之外，還要不斷深入進行人文交流。泉州南音在聯係海內外僑胞、增進與東南亞等地區文化交流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也有了新的時代意義。

一直以來，南音多以館閣形式活動，靠口傳方式傳承。手抄曲譜是其傳承的重要依憑，民間流傳的曲譜數量衆多，不同館閣師承間也往往抄譜有異。因此，對於南音尤其是南音曲譜，一直未有宏觀把握的文獻。呂鍾寬教授一直致力於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從事南音研究數十年。自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他便參與閩臺兩地南音的調查研究工作，不僅拜師學藝，親身學習南音彈唱，還在閩臺兩地開展廣泛的田野調查，在探訪南音館閣、尋訪民間藝人的過程中，收集到數量衆多的南音手抄曲譜。這些調查與研究，無疑為《泉州南音（絃管）集成》的編纂打下了良好基礎。

泉州師範學院延請呂鍾寬教授領銜組成學術團隊，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田野調查，完成《泉州南音（絃管）集成》，以宏篇彙集流布於閩南地區、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東南亞諸國的南音曲詞、曲譜的不同抄本，是對大陸、臺港澳以及東南亞地區南音傳承存續面貌的一次全面體現，對南音文化的整理、傳承和弘揚，具有重要意義，具有極大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

南音集成的編纂工作責任重、意義大，本應集合南音學術研究領域

衆多專家的力量來完成這項工作，但泉州師範學院畢竟不屬於文化行政部門，力量有限，故而選擇此種方式來進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拋磚引玉，為將來南音文獻的彙集整理工作起一個開啓的作用。當然，《泉州南音（絃管）集成》是一項浩大的工程，衆人雖竭盡心力，但不周全之處，在所難免。我們編纂這部集成，是我們對南音所做的奉獻，這樣做並非為了證明我們能做什麼，而是為了證明我們盡力在履行我們的職責與承諾。

編者謹識

2016年1月18日

序 三

懷念與感謝

呂錘寬

泉州南音/臺灣南管調查研究過程：起始於1978年，第一階段成果彙編為《泉州絃管（南管）指譜叢編》，於1987年由臺灣“文建會”出版；第二階段成果，於1993年臺北藝術大學規劃籌設“傳統音樂系”，將臺灣的南管（與北管）音樂設為主修項目，1995年正式招生，經由教學實踐，予南管音樂的活傳統以傳承保存；第三階段成果，喜獲泉州師範學院副校長王珊教授主持的泉州師範學院“福建省‘2011計劃’南音文化傳承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聘為“首席特聘研究員”及全力的支持，以《泉州南音（絃管）集成》保存歷代絃管家創作的有形曲詞與曲譜，並呈現該音樂體系的無形文化現象。本文將略述調查研究始末，突出地指出相關事例，以彰顯保存傳承泉州南音/臺灣南管的貢獻者。

音樂為人類的語言形式以及全民的共同文化財產，經由學習與傳播，世界各國人民能欣賞德國人巴赫、貝多芬或奧地利人莫札特的作品，相同地，中國的音樂藝術也能為各國人民共享；然而在政治帶動文化擴散的背景下，歐洲的高層次藝文項目，已普遍流傳於經濟發達的國家，至於歷史古老且極具特色的泉州南音（絃管），它如古琴音樂、崑曲，仍局限於漢族的特定文化圈，不但尚未國際化，也仍未成為各級學校的普遍性音樂教材內容。

由於國情與社會制度的差異，精神文化財產的保存有不同的難度：歐洲有保存文化財產的人文與社會機制，故該地區的音樂傳統，經由“音樂

學院”而鉅細靡遺地被保存；中國的文人階層精神文化如七絃琴、崑曲，大抵也能完好地保存於特定階層，至於自發性流傳於基層社會的泉州絃管，初始係流傳於特定地區，作為人們閑居游藝的節目，隨着社會的發展演變，由於教育體系完全忽視，音樂教育幾乎全盤西化，在價值觀念以歐洲藝術音樂為高的社會潮流，各地漢族傳統音樂成為隱性的文化甚而幾近消失。在此背景下，絃管從“自發性”的流傳，成為政府或文化界特意的“保存傳承”。所幸潛藏於底層社會的信仰民俗，仍默默地保存部分絃管文化，這種情形也讓人體察，在藝術性的基礎上，絃管仍具有社會與文化的功能，亦即今日所稱的泉州南音或臺灣南管，兼具藝術性與民俗性、儀式性，實為人類社會諸多音樂品種所少見的現象。

以整體文化觀，19世紀之前的絃管生態與內容，能透過手抄本之曲目彙整，以及為數眾多之傑出絃管家的生平，經由他們所擁有知識等之調查搜集，進行分析探討。進入20世紀60年代，由於政治與社會的發展，泉州南音或南管的生態產生較大的變化：在保存地泉州絃管文化圈的情形，此時在破四舊等因素的影響下，各類傳統音樂、戲曲曾經歷一段黑暗期；約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臺灣的南管開始踏出館閣，跳躍式地從國際化而社會化、學術化。進入21世紀，在經濟快速發展，伴隨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泉州南音登錄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之後，泉廈所屬的鄉鎮，館閣活動蓬勃發展，尤其是教育系統設有南音系/傳統音樂學系，從事南音/南管的教學之後，目前這些地區的城市民衆、尤其是學術界的藝文類學門，南音或南管逐漸成為知識界的通識。

泉州南音或臺灣南管的歷史雖悠久，在大環境中，則為隱性的傳統音樂文化現象，即使在20世紀70年代的臺灣，城市居民或學術界，對南管音樂仍甚為陌生，例如本人於就讀大學音樂系期間，在課程內容都是歐洲藝術音樂（包括實務與理論）的情形下，於四年學習階段，為了學習本國的傳統音樂，乃獨自在系內成立“中國音樂研究小組”，經由圖書館式的文獻搜集以及稱為“田野調查”的途徑，赴各地實際瞭解傳統音樂。當時所接觸的樂種/劇種為北管、歌子戲、布袋戲、誦經音樂，而雖云為一介學生，調查也有若干深入之處，例如曾邀請後來聞名國際的布袋戲大師李

天祿，於 1974 年前往系內做布袋戲的示範演出。當時系辦公室雖不允許舉辦該活動的宣傳（張貼海報），前來的觀賞者仍頗眾，包括學生與教授。在上述廣泛的搜尋下，雖已涉獵若干樂種與劇種，大學期間仍不知臺灣有南管音樂。中國大陸的情形亦然，離開福建，即罕有人知道閩南保存有如此悠久且藝術內涵高雅的中國古典音樂。

由於因緣際會，在學術養成過程中，不斷地獲得學術界長輩的提攜與相助，因而得以從完全不知有南管，轉而以該樂種為教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當 1978 年服畢兵役，旋即在國中任教，是時曾寫信請許常惠教授介紹工作，因而得以轉任職於臺北的洪健全視聽圖書館民族音樂組，此時才初次知道臺灣有南管，也頓然發覺：這就是多年追尋的古典音樂，乃開始經由實務學習琵琶彈奏與演唱，致力於南管音樂的調查研究。

1979 年，鹿港民俗暨發展委員會委託許常惠教授主持“鹿港地區南管音樂調查”，得有機會首次參與南管音樂的實地調查，負責音樂學部分的撰寫。1980 年，臺灣師範大學成立音樂研究所，乃在許老師（及吳春熙老師）指導下，於 1982 年完成論文《泉州絃管（南管）研究》。1986 年，許老師受“文建會”委託，主持“臺灣地區南管手抄本調查”，再次有幸參與調查研究，並以搜集的抄本為基礎，進行南管四類樂曲的論述，於 1987 年以《泉州絃管（南管）指譜叢編》出版。在音樂知識的學習過程中，得到許常惠老師（1929～2001）的指導與提攜，故而得以從完全不知有南管，進而以該樂種為閑居娛樂節目，並持而為教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特藉此篇首，懷念與感謝許老師在學術研究過程的信任與擢拔。

本集成經由南音 / 南管的調查研究，訪問優秀的絃管人，確信音樂的學習除了須具備較為抽象的天份，師承為掌握知識體系的關鍵。喜獲許常惠老師的引介，得以拜鹿港雅正齋的黃根柏（1910～1990）為南管先生，因此能夠獲得琵琶有固定彈奏指法的薰陶與技巧之掌握、散曲的唱念技巧與收音歸韻以及洞簫、二絃的引孔伴字的法則，感謝黃根柏先生在南管音樂方面的指導。

經由黃根柏先生的引介，得以認識能體現絃管風範的曾省先生（1917～1991）以及南聲社以蔡小月為主的館員。少小生長於泉州城內的